

数智时代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

——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理论视角*

张福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数智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支撑,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模式。新型生产关系是顺应时代发展、契合生产力发展需求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去把握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深入理解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支撑。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独特生产关系模式,并非仅仅是对原有生产关系的简单超越与重构,需要把握贯穿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中的核心问题。通过推进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内在潜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形成。

关键词:新型生产关系;本质特征;实现路径;社会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5)05-0001-12

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正步入数智时代。数智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支撑,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模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它由生产力决定并反作用于生产力。在数智时代,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517}因此,深入研究数智时代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对于理解数智时代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深层机

* 收稿日期:2025-06-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SGC024)“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机制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027)“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ZKJC240104)“新质生产力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张福军(1977—),男,河南信阳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张福军.数智时代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理论视角[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5):1-12.

理。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2]《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信中也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3]一定的生产力总是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当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的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便随之产生。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各要素能得到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4]然而,生产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地迎合生产力发展轨迹,它对生产力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凭借技术革命性突破与产业转型升级所产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也是在数字化平台基础上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516} 在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下,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了实时沟通和协作;不同企业之间能够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数字化打破了行业界限,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开展跨界协作。因此,进入数智时代,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受制于物理形态的约束,更加注重数字化、智能化和虚拟化,这些改变形成了新的数字化协作共享关系,必然要求重新形成现有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关系的超越,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成为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来源。

二、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阐述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在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中产生,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再生产4个环节全过程。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5]13} 进入数智时代,作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产生的新型生产关系,仍然可以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4个环节的重要论述去阐释其本质特征。其中,生产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环节为新型生产关系奠定物质基础;分配环节关系到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归谁所有,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决定于新型生产关系;交换环节构建起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交换是为了实现不同主体的经济利益;消费环节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形成新型

生产关系的最终归属。这四个环节相互依存、循环往复,彰显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

(一) 直接生产关系向“人—人—机”三维协同的范式跃迁

在数智技术深度渗透社会生产体系的背景下,生产关系正在突破传统“人—人”协作或“人—工具”单向控制方式,发展到“人与人”“人与机”“机与机”互动协同方式,形成智能互补、动态交互的新型协作关系。其中,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直接生产关系,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深度渗透社会生产体系后所形成的核心变革,这不仅重构了价值创造机制,更引发了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1. 人机协同模糊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间的边界

从生产过程价值创造上看,马克思认为,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数智时代的人机协同模糊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间的界限,似乎改变了马克思所论证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数智时代中“无人工厂”等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看似突破了传统劳动的范畴,不过是对脑力消耗的智力型劳动的拓展,是人机协同对传统生产方式下劳动者进行体力劳动的智能化替代,但本质仍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物化延伸。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早已特别阐释过,他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手创造出来的头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5]197-198}

进入数智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仍能为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的价值创造过程提供科学的阐释。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体系中,劳动者通过智能决策、算法设计等创造性劳动,将抽象劳动转化为数字化劳动,形成价值生产和价值创造的新途径。这种转化过程并未否定活劳动是价值创造源泉的地位,反而通过技术媒介方式实现了劳动形态向更高层级的升迁。

2. 生产过程中分工和协作突破了时空界限

马克思认为,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企业内部的分工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环节,每个工人专门从事一种特定的工作,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并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协作”中,详尽阐述了协作这种劳动形式在劳动者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基本特征。他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6]378}可见,协作是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协作跟分工一样,能够促进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进入数智时代,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逐步形成,实现了跨地域的实时控制,打破了传统分工协作的时空限制,从而使劳动者之间的分工程度更高更细,并产生“智能协作”新方式。一方面,由于技术条件能够保证生产过程的整体推进,这使得劳动者不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生产环节,而可以与其他劳动者通过分工协作参与到整个生产过程,也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即时沟通和有效合作。另一方面,部分劳动者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或远程办公,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进行信息交换与共享,打破了传统物理上的时间和空间制约,使得不同地域、不同环节的生产者能够实时开展分工协作,从而提升劳动者之间分工协作的水平,参与到虚实结合的整体生产过程中。

3. 扁平化、网络化生产组织形式将导致劳动者内部分化加剧

马克思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生产关系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体现,也是历史演进的核心动力之一。生产组织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演化,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不同的组织形

式塑造了不同的劳资关系、工人状况和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机器大工业,工人服务于机器,劳动过程依附于机器体系的运转节奏。

在数智化的生产过程中,从“人—机”协同关系上看,人与机器不再是简单的主从关系,而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关系,这也是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重大突破。人凭借自身的决策力、创造力和判断力,为机器下达开展生产活动的指令,而机器则凭借高速运算和不知疲倦的精准操作,高效率地完成重复性和规律性的生产任务。这种互助协同关系,不仅提高了生产效能,还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改变了传统的层级式管理结构的生产组织形式,逐渐向扁平化、网络化的管理结构转变。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方式将串联的生产过程转变为并联型的生产过程。不同环节之间不仅能够实现同时开展,而且相互之间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信息协调,更催生出“云协作”“众包生产”等新型组织形态。这对从事智能化生产的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具备数据分析、数字化沟通、智能软件应用等方面的技能,才能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传统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脑力劳动逐渐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复杂劳动转变,这必然会导致劳动者内部分化加剧。

(二)分配关系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本身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并且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的生产关系本身。”^[7]这一论断阐明了分配关系对生产关系的从属地位。在数智时代,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从而催生了以多元差异为特征的新型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1. 要素市场化改革催生新型分配主体

马克思强调,消费资料的分配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要素市场化改革举措作为调整“生产条件分配”的关键制度安排,正是推动新型分配主体产生的深层动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主体主要围绕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展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提出共产主义两阶段理论,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主体是代表社会的国家或集体组织。同时,马克思还指出:“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6]582}

进入数智时代,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智能化生产中,生产劳动的概念扩大了,出现了更多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者。同时,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种要素市场,参与分配的要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资本等要素分配,而是融入了数据、知识、创新能力等新的生产要素,分配主体呈现多元化、融合化趋势。

这些生产要素分别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在价值实现中都发挥了作用,因而也要参与分配,产生了众多的新型分配主体。一是技术要素主体。专利发明人、科研团队通过技术入股参与价值分配。二是数据要素主体。平台企业、数据生产者通过拥有数据产权获得收益。三是管理要素主体。职业经理人通过获得股权激励参与企业增值分配。四是平台上的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平台创造了价值,也要参与分配。这些新型分配主体的崛起,本质上是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分配关系,要素市场化正是对生产条件分配局面的重新调整,使得各类要素所有者凭借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与产权归属获得相应的回报,重构了多元的分配主体。

2. 以数据、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进而改变了分配结构

马克思通过批判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同时也承认生产资料(物化劳动)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数据与技术日益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智时代,数据与

技术所有者参与分配正深刻重塑着现有的分配结构。

进入数智时代,新型分配主体的收益来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资、利润等分配形式,还包括数据租金、技术专利费、管理分红等多种分配形式。从微观来看,从事传统领域获取的劳动报酬,与从事“知识型劳动”和“数据加工劳动”获取的报酬相比,呈现下降趋势。这是因为算法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等拥有数据处理能力的数字劳动者,凭借复杂劳动创造的高额价值,获得明显高于传统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以及平台企业极大压缩了直接生产环节的劳动力需求,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加工处理,会形成“数据资本化”收益,资本与技术要素在价值分配中的比重显著提升。这种分配结构上的变化,体现了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符合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

3. 探索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可行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方面。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8],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这一目标的具体体现。

形成新型分配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探索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可行路径。一是通过新型分配主体的多元化重构,打破传统资本主义分配中资本一家独大的困局,成功破解“资本单极主导”的历史性难题,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结构。二是为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不少高科技企业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使劳动者兼具资本主体身份,成为生产资料真正的主人。三是通过税收优惠与荣誉表彰等举措,积极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投身慈善公益事业。随着第三次分配主体的逐步形成,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政策体系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形成一种平等互助与互利合作的新型生产关系,探索出一条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路径。四是新型分配关系强调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分配,注重对创新与劳动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这有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通过设计合理的分配制度,促使不同类型的群体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 交换关系呈现出虚实结合的新型交换特征

马克思认为,交换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交换关系的变化本质上是生产力革命引发的生产关系调整的外在表现,交换关系从属于更深层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还指出:“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9]这句话鲜明地指出,马克思深刻批判了那些不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的错误观点,强调生产方式对交易方式的决定性作用。进入数智时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从而为交换关系增添了新的特征。

1. 平台经济的崛起重构了市场交换模式

马克思认为,交换形式、范围和规模都是由生产结构所决定的,从本质上看交换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在流通领域的表现,但绝非简单的物物转移,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物化表现与再生产机制。进入数智时代,数字平台作为新型组织形态,连接着海量消费者、内容创作者、服务提供者以及广告商等。平台企业作为核心节点,制定复杂的计价、分成与激励机制,实质上扮演着新型交换枢纽的角色,只不过是在无形的交换场所里进行交易。

一般来说,平台经济的业务模式可以分为交易型平台经济和服务型平台经济。对于交易型平台来说,平台企业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场所、信息展示、支付保障等服务,促进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平台企业

通过控制应用商店、电商平台等交换节点,迫使生产者接受分成规则,平台企业将人对人的支配转化为“人—算法”关系,通过算法调整,影响平台上各方的利益分配,且算法调整权力集中在平台企业手中,其他各方只能被动接受。同时,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控制重构了市场交换机制,可能实施价格操控,如强迫客户接受定价策略、采用最惠定价或掠夺式定价策略以及分级多重价格策略实现价格歧视等。对于服务型平台来说,从表象上看,骑手“自由”接单、博主“自主”创作、网约车司机“灵活”工作看似平等交易,平台企业也宣称提供“中立技术工具”,用户“平等”参与市场,实质上是平台企业在复制形式平等机制,通过评分系统、派单逻辑、流量分配等黑箱算法控制劳动过程,并通过数据垄断,占有用户数据,强化议价能力,部分价值被平台无偿占有。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关系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使不公平的关系被市场中的所谓“公平交易”所掩盖,市场交换的形式上的平等,恰恰掩盖资本是实质性支配。在数智时代,平台企业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只不过是流通领域的表象,掩盖了其在生产领域的支配地位,并通过技术黑箱被强化,但不平等的交换本质未变。只有打破数据与算法的私有控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交换。

2. 虚拟货币的兴起让交换关系具有网络虚拟化特质

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6]108},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入数智时代,市场上交换的货币不仅仅是以传统的实物形式存在,还出现了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与传统货币一样,在市场交易中充当交换媒介,并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虚拟货币的使用,显著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便捷性,让交换关系的市场载体具备了鲜明的网络虚拟化特质。一是线上线下融合的商品交换。在传统经济模式中,商品交换主要通过实体店铺、商场等线下场所进行。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线上购物平台成为商品交换的重要渠道。消费者能够在线购买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同时线下的实体店铺也能提供商品体验与即时提货等服务。消费者可以在实体店体验商品后,通过线上平台下单购买;也可以在线上研究商品信息后,到线下门店进行实际选购。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使得商品交换更加便捷、高效。二是虚拟产品和服务的交换。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产品和服务在交换关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游戏、软件、在线教育、数字音乐、远程医疗等虚拟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更加频繁。这些虚拟产品和服务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和交易。三是虚实结合的金融交换。随着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区块链金融等虚拟金融形式的不断涌现。电子支付使得金融交易更加便捷,数字货币为跨境交易与金融创新提供了新的支付方式。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让金融交易更加透明、安全,产生了各种虚拟金融资产和交易平台。

3. 数字技术实现了交换过程的即时化与去地域化

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过程必须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交换场所是商品流通得以实现的物质载体。他指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终止了。”^{[5]46}进入数智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处于流通环节的交换市场不再仅仅是以有形的市场存在,逐渐向虚拟化交易平台方向发展,形成了虚实结合的交易场所,从而实现了交换过程的即时化与去地域化。

数字平台的发展使得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不再受地域限制,各类企业建立了全球化的销售网络,购买者也来自世界各地,双方都可以通过网络销售平台进行交易,即便是有形的产品,快速便捷的物流网络也使得双方不再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因此,虚实结合的交换关系打破了传统交换方式的时空限制,使得

商品和服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快速地到达购买者手中,提高了交换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

(四) 消费关系推动新型消费的人本价值回归

马克思在《资本论》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中,深刻阐述了消费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消费并非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或终点,而是要将其置于整个社会再生产循环中,揭示其如何反映、维持和再生产特定的生产关系。因此,消费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消费什么、如何消费、消费多少,本质上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进入数智时代,消费环节仍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于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绿色共享成为新型消费关系的重要特征。

1. 迈向生产与消费有机统一的新境界

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15},没有消费,生产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产品无法最终实现其价值,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指出,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同一性”,两者互为媒介、相互依存。“生产生产着消费”^{[5]16},这说明生产不仅为消费提供对象,更决定着消费的方式与动力^[10];而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并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这一辩证关系在新型生产关系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一方面,在新型生产关系下,科技进步促使生产不断创新,创造出大量新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催生出电商购物、移动支付、在线娱乐等新的消费形式。这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生产着消费”^{[5]16},生产不仅为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还塑造了消费的形态和模式。生产的发展决定了消费的可能性和范围,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5]15}在数智时代,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消费对生产的引导作用愈发明显。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从而调整生产策略,生产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这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为生产提供了目标和方向,促使生产不断适应消费的变化。

2. 共享消费重构使用权与所有权关系

马克思是分两个层次对商品和商品交换进行分析,一类是普通商品。在商品交换中,当买方支付货币购买一件普通商品时,同时获得了该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统一。另一类是劳动力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工人在市场上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工人出售的不是自己的人身所有权,而是劳动力的使用权。资本家通过支配劳动力的使用权,在生产过程中强制工人进行剩余劳动,从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

进入数智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在线支付体系的创新,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也为共享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基于数字平台所产生的共享经济,通过整合数据等生产要素,稳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由于这类产品和服务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消费者对这类商品的使用并不具有排他性,带有特定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消费者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所有权观念和交易模式,不再追求物质上的占有,而是更加关注产品的使用体验,推动消费重心从所有权向使用权转移。

3. 新型消费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本质在于将人当作资本增殖的工具,使消费背离人的真实需求。马克思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所有的人富裕”与“按需分配”,核心价值在于阐释消费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型生产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推动消费的人本价值回归,彰显新型消费关系的价值所

在。

形成新型消费关系,消费行为被赋予生态伦理内涵,强化了消费的生态属性与社会责任,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观。同时,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逐步解放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使闲暇时间变得更加宽裕,旅游、文化、教育等高层次消费需求快速发展。消费不再是私有制下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发展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条件”的获取过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文化支撑。因此,新型消费关系将消费视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载体,使消费回归人本价值本质,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需要把握的核心问题

新型生产关系是顺应时代发展、契合生产力发展需求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从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去把握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深入理解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支撑。然而,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基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独特生产关系模式,应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还需要把握社会再生产4个环节中的核心问题。

(一) 生产环节应重塑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生产环节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与核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新型生产关系在生产领域的形成,核心在于解决所有制结构问题。

随着数字经济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企业、政府和个人在数据的收集、使用 and 分享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数据的所有权归属尚不明确。对于如何界定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边界,已成为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由于数据产权的归属问题已成为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重要依据,势必会影响到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作为新型生产资料的数字化要素已突破传统产权框架,但目前的数据确权处于真空状态,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来界定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导致“数据圈地运动”频发。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数据资源,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如强制用户授权、过度收集数据等。由于这类平台企业大多数属于非公有制企业,从而影响到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这对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要积极探寻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新型混合所有制经济,保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属性,以达成对数据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

(二) 分配环节应考察不同主体之间分配关系的转变

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分配形式涉及到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否。按劳分配作为我国分配制度的重要原则,强调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同时,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也是我国重要的分配制度,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取相应的报酬。

进入数智时代,数据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来优化生产流程

和提升创新能力,并把数据作为一种无形产品进行交易,将掌握的数据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利润水平,由于企业掌握了大量数据的关键信息和产权归属,因而在产品分配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尽管劳动者是数据与技术的重要提供者和参与者,并不能获取数据带来的大部分增值收益,仅仅获得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在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在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过程中,需要按照多元化方式对收益进行分配,不仅要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还要反映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贡献大小的分配制度。

(三) 交换环节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绕不开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1]556},并“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1]556}。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及打通国民经济整个循环系统中断点堵点的重要任务。然而,当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诸多堵点: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依然存在,商品要素循环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尚不完备^[11];市场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进一步完善优化市场竞争环境迫在眉睫。

针对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搞各自为政的“小循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1]377}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针对全国而言的,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1]337},迫切需要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种要素资源国内循环畅通无阻^[12]。

(四) 消费环节应引导消费者实现对“异化消费”的超越

当前“异化消费”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的消费行为与价值取向,这种消费模式不仅使人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更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与我国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首先,消费者不再是消费行为的主体,而沦为商品的奴仆,通过不断占有商品来寻求身份认同和存在价值。这种物我对立的关系,使消费从实现人类自由的手段异化为束缚人性的枷锁。其次,异化消费的核心在于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逐远超其使用价值。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不是为了这类商品的实用功能,而是将其作为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的象征。最后,在异化消费中,消费行为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满足真实需求的手段。购物狂、“剁手党”等现象的涌现,反映了消费已异化为一种消除精神空虚的强迫性行为。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这就需要引导消费从满足“虚假需求”回归满足真实、健康、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劳动者提供发展自身才能、享受闲暇、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物质条件。然而,我国消费调控政策往往停留在短期刺激层面,缺乏对消费观念的长效引导机制。制度层面的缺失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制空白,消费领域无法可依;政策导向偏差,对可持续消费重视不足;监管机制缺位,对数据杀熟、过度包装、预付式消费陷阱等异化消费现象缺乏有效约束。

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实现路径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并非仅仅是对原有生产关系的简单超越与重构,更是着眼于新时代科技革命与

产业变革,具有深远的战略引领意义。通过推进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内在潜能,不仅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显著跃升,而且能够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形成。

(一) 深化所有制改革,探索新型所有制形式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决定着产品的分配关系。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充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中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通过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各自优势,构建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市场中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发展格局,为新型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发展奠定基础。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形成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特别是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支柱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尖端科技等方面,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强化国有企业率先落实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任务,通过科技创新突破“卡脖子”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获得长期稳定的盈利能力,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构成要素。不断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生态,为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通过不断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有效化解民营经济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要素获取等方面所遭遇的难题。同时,还要不断推动民营企业在能源革命、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全球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高科技前沿领域先行者与探索者的重要作用。

(二)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分配形式加速形成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在数智时代,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进一步完善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评价与分配机制,依托市场精准评估各生产要素的实际贡献,并依据贡献大小合理确定报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市场评价机制能够准确衡量各类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实际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则能确保各类主体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益,从而极大地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和创新力。

二是健全分配体制机制,提升劳动报酬比重。因地制宜地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新质生产力强调对要素资源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与优化,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人才素质和产业升级,这种生产力的变革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由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往往具有创新性强、发展潜力大的特点,需要投入大量的新型劳动者和创新要素,因而需要催生与之适配的新型分配形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进行分配,确保新型劳动者能够获取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合理劳动报酬。

三是推动融合体制建设,促进新型要素分配。随着数据等新型要素逐渐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为数据等新型要素量身打造一套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和紧迫。这需要综合研判新型要素贡献度、稀缺性等因素,建立科学的数据产权制度、数据流通和交易规则等,确保数据要素在价值

创造和收益分配中能够合理体现其贡献。

(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1]517-518} 这一论断深刻阐释了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中的协同并进关系。

一是深化市场基础制度改革。构建完善的制度框架与政策机制,推动商品和要素资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实现高效、顺畅的流通。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公共部门和各类企业积极开放并共享数据资源。同时,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数据流通、交易、使用及分配模式,推动各种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通。

二是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弥补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中的不足,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加大国家对基础研究、竞争前阶段的创新投入力度,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卡脖子”技术,不断优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制度。有效引导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实现无缝衔接,联合开展攻关,加速攻克关键技术难题。

三是加快推出并细化平台经济规范发展的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公平竞争监管制度等基础性制度,切实维护平台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有效敦促平台合规自治,引导平台企业合理收费,防止侵犯各类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消费模式

异化消费的超越本质上是人的主体性重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定位,这就需要构建一种以人的真实需求为中心、以生态承载力为边界的消费生态。这种消费生态既不是禁欲主义的自我否定,也不是享乐主义的放纵无度,而是一种回归本真的理性消费模式。消费不再是对商品的占有和符号的追逐,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1]356} 为此,政府应构建多层次制度保障体系,为超越异化消费提供政策支持。

一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加快制定《绿色消费促进法》,明确过度消费的法律责任,将“碳足迹”纳入消费行为规范,引导民众重建科学的绿色消费意识形态^[14]。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针对场景消费时代的特点,拓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功能定位。二是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出台提升消费能力和改善消费环境专项举措,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三是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放宽准入、减少限制、优化监管等方面入手,扩大多元化消费服务供给。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3.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592.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60.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3.
- [10] 盛朝迅,荣晨,吴迪.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标志与对策研究[J]. 宏观质量研究, 2022 (6):1-13.
- [11] 卢现祥,王素素. 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南北差异及形成机理[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11): 21-42.
- [12] 张福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3 (3):22-31.
- [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14] 王仁源. 异化消费的危害及其治理阐释[J]. 中国集体经济,2023(30):104-107.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ce Era: A Perspective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the "Four Links" in Social Reproduction

ZHANG Fujun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upported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modes of production, exchang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at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meets the needs of productive forces. Grasp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the "four links" of Marx's social reproduc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Form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ompatible with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unique model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stage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t is not merely a simple transcend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requires grasping the core issues running through the "four link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By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eforms in aspects such as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internal potential of various market players can be effectively stimulated, thus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realization path; social reproduction

(责任编辑:邓龙奎)